

XIE XIAO SHUO DE BIAN ZHENG FA

写小说的辩证法

张贤亮 著



写小说的辩证法

张贤亮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朱展程

写小说的辩证法

张贤亮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650×1092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44,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10078·3887 定价：1.70元

理性激发灵感

——前言

潘自强同志编完了这本我谈文学创作的书稿，拿来要我写篇前言，正值我在构思一部新的电影。

在偏远的宁夏，人们在干着一件尚不为世人注目的事。“调庄”，这个词极少有人能够理解。它指的是把居住在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山区的贫困居民向改造过的荒原迁移。宁夏的南部山区，几乎是不毛之地，黄土堆成的群山铜似地沉默着，顽固地拒绝长出一片绿叶。老百姓的穷困，即使在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国家按最低水准来衡量，也是骇人听闻的。直到一九七九年以前，很多农民家庭还是三个人合穿一条裤子，人们靠一小撮救济粮苟延残喘，在干旱的山地撒下明知毫无收成的种子以后，就成群结队地外出讨饭。七十年代初期，漫山遍野的老百姓穿的都是海陆空军的制服，如果有外国的侦察卫星照见，还以为这里是一处军事重地。其实是因为没有一家能拿出钱来将发给他们的布票换成布料，只得靠部队施舍。干旱和救济培养出懒汉和懒婆，既然在这块土地上投下去的全部劳动都将是无效劳动，又何必拚死拚活地干呢？这里没有文化，如果对“寻根”有兴趣的作家来考察，他会发现此地只不过比新石器时代略为进步一

点而已。同时，山区还有一种可怕的地方病世代地折磨着人们。这种称为氟骨症的致命疾病完全是由饮用水造成的。得了这种病的人“抬头不见青天，低头不见脚尖”。也就是说，他们的脖颈丧失了运转功能，永远只能平视，用痴呆的目光冷漠地注视着这个对他们不公正的世界。有一天，天上飞来架直升飞机，正在田里干活的人要看稀奇，只好全部仰卧在地上，才能把视线射向这种现代的航空工具。但是，这种病却不妨碍生殖，于是他们生活的乐趣就集中在土炕上，使身体素质低劣的人口不断繁衍出来。一个解放初期只有五万人的小县，三十年中翻了几番，除去死亡逃荒之外，竟还有二十五万人口。人类在这里陷入了恶性循环。

从七十年代后期，宁夏的党政干部开始领导农民群众试图改变这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他们选择了一片数十万亩面积的黄土高原二级台地，修筑了上千公里的大小渠道，把黄河水经三级提升引了上来，在台地上铺了近百公里道路，建造了上万间房屋，分期分批地将衣不蔽体、鸱首鹄面、委顿不堪的山区农民迁移到这片新的土地。有道是“破家值万贯”，农民搬家是连一根柴禾、一截烂绳头都不舍得撂下的，就这样，一辆轻型卡车居然也可拉走五个祖孙同堂的大家庭。而现在，一九八六年夏，当我去参观的时候，我发现这里完全是一派绿树成荫、流水潺潺、羊群悠然的田园牧歌景象，酷似我在美国波士顿历史博物馆看到的美洲早期移民的村庄。移民们红润的面孔，愉快而自信的神情，慷慨好客的气度，也使我想起了我在油画上曾见过的新英格兰人。

这一切使我激动不已。我自然非常想把我所见的人与

事用艺术表现出来。但凡是懂行的人都可以想象，这个建设过程，这种变化，只适合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去写。当然，在这场变革中肯定有人的悲欢离合的命运，有命运的生动而丰富的情节，可是，如果写成小说，至多是一部农民们如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穷变富的故事。老实说，这种故事由于写得太多，尽管是真实的、有感情的，也显得平庸和乏味了。创作，就是要突破平庸。在无法突破题材的一般化时，就要极力找到一个新的角度，想出一个新的构架。新的角度和新的构架本身就可以突破题材的一般化，把和别的文学艺术作品同样的题材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因为这项工程在一九八二年以后，列入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总署的支援项目，这片荒原上曾来过几批联合国官员和外国记者。于是，这触动了我的思考：我在这几十万亩黄土高原二级台地上所见到的一切，是不是给全人类提供了一个范例，创造了一条经验呢？现在，第三世界占世界的四分之三，它的人口超过三十亿，而其中的三分之一却在挨饿；一九七九年曾被宣布为国际儿童年，事实上却成了儿童死亡年，一千二百万五岁以下的儿童因饥饿丧失了生命；五亿亚洲人，一亿四千万非洲人，九千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居民喝不到能饮用的水。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也曾试图“彻底解决粮食问题”，结果是大地向人们进行了报复。由于破坏了千百年来人与大自然之间达成的“协议”，肥沃的土壤地力衰退，森林覆盖面积缩小，气候恶化，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土质日趋贫瘠。人类在那里同样陷入了恶性循环。

尼赫鲁曾对铁托说过：“在我看来，当今世界的根本分歧并不是共产党国家和反共国家之间的分歧，而是拥有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的国家和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法国人弗朗兹·法农在一九六〇年就曾写道：“我们应当告诉资本主义国家，向它们讲清楚，当代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应该结束这场没有任何前途的‘冷战’，防止世界核化，慷慨投资，并在技术上援助不发达地区。世界的命运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现在，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在一个饥饿的世界上，敌人不是共产主义，而是饥饿。连指挥过侵越战争的美国前国防部长，嗣后为世界银行行长的麦克纳马拉也这样认为：“南北之间在经济方面脱节。这种差别，从社会学观点来看，犹如地壳上出现的一个裂开的地震断层。它能够、并且很快就会引起可怕的轰鸣和震动。如果富国不加倍努力，填平繁华过度的北半球和饥馑的南半球之间的鸿沟，最终谁也休想得到安宁，即便是储存大量的武器也无济于事。”^①

就在我参观这块黄土高原二级台地的那天，在埃塞俄比亚，从各国募集来的大批食品和药品由于交通不便而堆积在港口，而内陆的数以万计的饥民却在干旱的沙土上奄奄待毙。在此之前，援助非洲饥荒的运动已经成了世界性的运动；这是一场人类救助人类自己的空前的行为。面对着严酷的大自然，面对着严峻的异己力量，全球各个角落的

① 参见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世界面临挑战》。

人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不分政治观点、不分职业、不分阶级采取了规模宏大的统一行动，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道主义的范畴。我们可以这样说，非洲的大饥荒给人类带来了团结和和平的黎明。

而在宁夏这块小小的土地上，“调庄”工程在默默地进行着。即使主持这项工程的领导干部，也仅仅认为他们的工作说到顶不过是“为民造福”而已。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手头搞的事业具有世界意义，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尽其可能地在当代给人类迫切面临的如何与自然相处的问题上提供了一个范例，给第三世界如何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利用外援，以缩小南北差距创造了一个经验。如果我们也把认识的层次固定在“为民造福”上面，写出来的电影不可避免地也仅仅是“歌功颂德”罢了。这样的电影，当然也只能是反映一家农民或数家农民生活变化的农村片。但是，这里，理性的思考帮助了我们。我和我的合作者李唯（《黑炮事件》编剧）在认识到这片不大的土地上的变化的实质之后，马上就找到了一个新颖而恰当的角度。这就是不用中国人的眼睛，而用一个外国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官员的眼睛来看这项工程。一个外国人看中国，常常比身在庐山的中国人更对我们的历史感兴趣。这样，纵的方向，我们就可展示达数百年黄河边的小县文化。并且，既然是一个来自异国的人，他的眼睛肯定带着比较的目光，于是，横的方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题材放在广阔的世界背景上。这样的角度，必然要打破一般电影的封闭性构架，建立新的开放性构架。这种开放性构架是什么素材都可以往里面塞的。从他来中国后接触到的各级干部、各色人等又可分出枝蔓，展现社会的某几

个侧面和参与这项工程的各种人的性格和生活。这就使我们能够挥洒自如，不拘泥于去编织一个完整的故事。

现在电影还没有写出来，但是由理性的思考启发起来的灵感使我们具有了写好它的信心。我之所以在这里先说了这许多话，不过是由潘自强同志编的我这本集子而引起的。我觉得我在这本集子里说的创作方法似乎与我前面所说的构思过程大致相同。然而，法无定法，文海无边，现在，小说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写小说自然就有各式各样的写法。我决不认为我写小说的方法是好的方法，好象在写小说上也并不存在什么好的方法和坏的方法之分；我也不认为我的创作和读书经验会给文学青年提供什么范例，因为心灵的工程要比“调庄”工程复杂得多。人类已经发现，人类自身是无法解释的，人面临的永恒的谜就是他自己。要不，活着就太没意思了。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八日

目 录

理性激发灵感

——前言 1

第 一 辑

从库图佐夫的独眼和纳尔逊的断臂谈起

——《灵与肉》之外的话 3

满纸荒唐言 9

牧马人的灵与肉 17

不可取的经验 22

《肖尔布拉克》与《河的子孙》 25

答文学青年问 28

关于《绿化树》的一些说明 35

关于《绿化树》

——在《十月》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 39

必须进入自由状态

——写在专业创作的第三年 42

同宁夏大学学生谈文学 56

作家的修养 65

关于《土牢情话》 73

《灵与肉》泰文本序·····	77
《绿化树》英译本序·····	80
悟性与理性·····	84

第 二 辑

深入生活与学习理论·····	99
努力提高认识生活的能力 ·····	101
深入生活与认识生活 ·····	105
抓住时代的脉搏 ·····	108
秋凉夜话 ·····	113
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讨论会上的发言 ·····	122
在爱荷华告别宴会上的讲演 ·····	125
中国当代作家在艺术上的追求 ·····	127
新诗的追求 ·····	133

第 三 辑

一九五七年给《延河》编辑部的信

附：《大风歌》后记 ·····	145
心灵和肉体的变化	
——关于短篇《灵与肉》的通讯 ·····	151
“人是靠头脑，也就是靠思想站着的……” ·····	157
以简代稿谈《龙种》 ·····	164
写小说的辩证法 ·····	168
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 ·····	182
关于时代与文学的思考	
——致维熙 ·····	193

• 8 •

关键在于改造和发展我们的文学201

《老人二题》209

编后记.....潘自强 212



第一輯

从库图佐夫的独眼 和纳尔逊的断臂谈起

——《灵与肉》之外的话

小时候，翻看世界名将肖像画册，我觉得独眼的库图佐夫和一只胳膊的纳尔逊，比恺撒和安东尼更有震慑人心的力量。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何许人也，属于什么阶级成份，而画面上给人的却是一种雄健的、严峻的、深沉的美感。这种美感，和欣赏《蒙娜丽莎》与《雷卡米埃夫人》时获得的美感在质上有微妙的区别，而程度上却是同样的。独眼和断臂这样的伤痕，非但没有损害他们的形象，反而给他们增添了特别吸引人的丰采，使人不由得联想到他们的痛苦和他们的斗争，敬仰之情油然而生。这里，缺陷构成了美。

在长达十年，甚至二十余年的“左”的路线统治下，人们肉体上和心灵上留下了这样或那样的伤痕，这是无可讳言的。现在有许多文艺作品写的就是这些。但是，怎样有意识地把这种种伤痕中能使人振奋、使人前进的那一面表现出来，不仅引起人哲理性的思考，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还并不为相当多的作者所重视。《灵与肉》不过想在这方面做个尝试而已。

然而，痛苦中的欢乐，伤痕上的美，绝不是能编造出来

的。在这种题材上强加笑料或涂抹华丽的色彩，只会令人啼笑皆非，莫知所云。这里，美和欢乐，必须来自伤痕和痛苦本身，来自对于这种生活的深刻的体验。我在二十一时因发表《大风歌》被错划为右派后，明关暗监二十年，真是“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陈与义《临江仙》）；但劳动人民给我的抚慰，祖国自然山川给我的熏陶，体力劳动给我的锻炼，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给我的启示（这绝不是虚言，那时只能看到这些书），始终象暗洞中的石钟乳上滴下的水珠，一滴、一滴地滋润着我的心田。我，正是凭着这些才幸存下来的。

当然，伤痕能表现出一种缺陷美，也只有在伤愈之后的眼球尚吊在眼眶外面的库图佐夫和还捧着血淋淋的胳膊的纳尔逊，尽管画面上是一片红海洋，也只会使人恐怖战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痛定思痛，我们是可以从那些惨痛的经历中提炼出美的元素的；三中全会后的路线，是画面上的伤痕能表现出美的光辉的底色。

以上是我构思《灵与肉》时的基调。

《灵与肉》并不是出于当前有些人想出国，以致人才外流这种背景的考虑写的。宁夏地处边陲，弹丸之地，我又陋见寡闻，这种情况在我心目中还不占多大份量。写《灵与肉》，一，我是为了反我一直深恶痛绝的“血统论”；二，我想表现体力劳动和与体力劳动者的接触对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小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及三十年历史变迁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新调整。

一九五七年批判我时，我的一位好友（现在仍是我的好友）在《延河》上发了一篇《张贤亮是什么人》，大部分篇幅却

是我祖父和父亲的历史，真如曹操说陈琳的话：“荼及先人”，还加了许多艺术的虚构。我理解，他也和陈琳一样，不过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可是后来，这就成了我一次次的判决书中的主要依据，搞得我有口难辩，苦不堪言。然而，我私下里一直认为思想意识和精神灵魂方面的东西是不会通过染色体遗传到下一代的肉体上的。受其苦深，其印象亦深，所以，我几篇小说都是围绕这种主题展开或与此有关的。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小知识分子，通过长期的严酷的体力劳动，他从肉体到灵魂一定会发生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不仅会背叛自己的阶级出身，重新组合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会获得更深刻、更广阔、更丰富、更高尚的感受与情操。这种说法，现在好象已经不那么时髦了，而且我相信，今后也不可能再有人用这种手段来整脑力劳动者，而美其名曰“再教育”了。但是，那一段历史毕竟是个过去了的客观存在，凡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脑力劳动者，现在缅怀往事的时候，也一定会感到体力劳动和与体力劳动者长期的共事，在自己身上留下的良好影响和美好的回忆。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就说过，无产者不是白白经历了劳动的炼狱的。不过，这种结果，倒不是一手拿着判决书，一手拿着鞭子的人所料到的。

写出来后，有的同志说：“你最好写个高级知识分子，这样……”我理解这种要求，但是，我觉得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人翁更能体现出一般性和普遍性；同时，我自己也就是个小知识分子，这样写比较得心应手，贯注入我本身的感受。至于理念和思想方面的事，我是这样看的，在林彪、“四人帮”